

4.25 朱镕基带我们走进中南海



1999年4月25日早晨，我到达府右街北口时大约七点半钟。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多学员，人虽然很多，但既没有阻塞交通，也没有喧哗声，排列得整整齐齐。沿途我见到许多便衣，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。

正往前走，忽然身后人群中响起了掌声，在清晨的宁静中显得清脆。我转身一看，几十米之外，朱镕基正走出对面的大门，身后跟着几个工作人员。我快步走，往朱镕基身边靠近。

朱镕基大声问道：“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谁叫你们来的？”“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！”

“我们是法轮功学员，我们来反映情况。”人群中有一学员回答道。

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你们派代表来，我带你们进去谈。”朱镕基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

呀！”

“你们有代表吗？你们谁是代表？”他又问。

这时，我已到了距离朱镕基不过2米的地方。“朱总理，我可以去。”我首先自告奋勇地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。

“还有谁？”朱镕基问。

“我！”

“我！”

“还有我！”

……这时大家纷纷举手。

“人不能太多。”朱镕基在站出来的学员中指了指我们站出来的三个人。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中南海西门走去。他边走边大声问道：“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？”

“我们没有看到呀！”我们几个都愕然地回答。

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，换了话题说：

“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，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。”说着转向工作人员，吩咐找人。工作人员带我们

左转进了传达室，而朱镕基进中南海上班去了。

不一会，进来四位三、四十岁模样的官员。“我们受总理委托来了解情况，你们先登记一下。”他说。我们三个依次报上姓名、单位和电话。我这时才结识另外两位学员。

其中一位女学员是北大某计算机公司的职员，她首先说：“何祚庥在天津《青少年科技博览》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……”

“谁？”信访局的那位负责人似乎没听清，打断她的话问道。

“何祚庥。”我们几个一起说。

“不就一个何祚庥吗？！”他边记录边说，语气中透出几分轻蔑。

“又是何祚庥？！”另一个官员低声嘟哝。

“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澄清真实情况，却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，希望能尽快释放他们。”

女学员接着说。从他们记录时的表情看，似乎有的知道情况。但四十多岁的那位似乎不知道，他转向身边年轻的一位，意思好像是核实一下天津的情况。

“法轮功修炼

‘真、善、忍’。

我们通过修炼亲身受益，就先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，他们修炼一段时间受益后，又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，就这样人传人心，修炼的人越来越多。现在，一些地方学员炼功受到干扰，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。”女学员和另一位下岗工人学员都反映了这个情况。

“还有《转法轮》本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，但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，导致社会上出现很多盗版书。希望允许《转法轮》公开出版发行。”我把以前写信反映过的情况也提出来。

四位官员边听边记录。我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又补充了一些自己知道的情况。

我们还谈到既然中央确定了关于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“三不政策”（不宣传、不争论、不打棍子），各级政府机关和新闻单位就应当贯彻执行。

那位四十多岁的官员说：“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将向国务院和中央领导汇报。请你们出去后，叫大

家回去，尽快回家。”

临走的时候把我们带来的几本《转法轮》送给他们，请中央领导阅读。

出来之后，学员们很关心天津公安是否放人。我简单的向站在西门口的学员介绍了情况，以及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放人。因此大家仍然在原地站着。旁边一直有便衣注意着我的一言一行，他们心里可能以为我是上访的组织者之一，或者我是某某负责人，所以一直在跟踪。事实上，我只是普通的炼功者之一。（几天之后，单位同事告诉我那天晚上就有人查了我的档案，但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特殊经历。）

我觉得刚才的上访已经反映了我关心的问题。那天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于是从中南海出来不久我就回去了。文/石采东

石采东，法轮大法弟子，99年“4.25”时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，2002年11月起在美国特拉华大学作访问学者，现居纽约。

法轮大法，也称法轮功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要求修炼人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的原则修炼，做“先他后我”的好人。人们因修炼法轮功而无疾无病，多年的疾病顽症消失了，身体得到康复，人们因信仰“真、善、忍”而无私无恨，曾有不良恶习的，改正了；家庭和睦了。现在法轮功学员已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涵盖各种族，各种文化背景。其中很多人是工程师、医学博士、科学家、教授及各行各业的佼佼者。法轮大法以她博大精深的法理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，以及修炼人道德升华的举世瞩目的事实，告诉人们：法轮大法是正法。